

『十二五』国家重点图书出版规划项目

宋词中的身体叙事

——经济因素的渗透与反映

○ 窦丽梅 著

河南人民出版社

中国
传
统
文
学
与
经
济
生
活

『十二五』国家重点图书出版规划项目

上海财经大学『12工程』资助项目

宋词中的身体叙事

——经济因素的渗透与反映

○ 窦丽梅 著

河南人民出版社

张觉 裴毅然 主编

中
国
传
统
文
学
与
经
济
生
活
研
究
丛
书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宋词中的身体叙事:经济因素的渗透与反映/窦
丽梅著. —郑州:河南人民出版社,2012. 2
(中国传统文学与经济生活研究丛书)
ISBN 978 - 7 - 215 - 07666 - 2

I. ①宋… II. ①窦… III. ①宋词—文学研究
IV. ①I207.23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1)第 105086 号

河南人民出版社出版发行

(地址:郑州市经五路 66 号 邮政编码:450002 电话:65788036)

新华书店经销 河南省瑞光印务股份有限公司印刷

开本 890 毫米×1240 毫米 1/32 印张 10.125

字数 320 千字

2012 年 2 月第 1 版 2012 年 2 月第 1 次印刷

定价:30.00 元



总 序

2000年,在全国高校扩大规模的大背景下,向以财经专业见长的上海财经大学成立中文系。我校增设文史专业,既是借鉴伦敦经济学院的办学思路(这所全球知名的财经院校出了两位诺贝尔文学奖获得者),也是为了突破我校单一财经专业结构,从宏观上提高全校学生的人文素质。

至2006年,中文系的发展初见成效,除本科专业,先后建立三个硕士点。2007年,中文系向学校申请了与本校优势专业相结合的集体研究项目“经济社会发展与文学关系研究”。该项目的预期成果由15本系列专著组成(一套丛书),拟研讨上古至当代经济生活与文学发展之关系。是年,批准为我校“211工程”三期项目。

从经济生活与社会发展角度研究文学乃是一项具有相当穿越性的新论域。经济学与文学相结合,打通满足物质欲望与精神欲望的两大学科,以此拓宽文学研究领域,既关注文学作为艺术品的审美功能,又重视文学作为文化消费品的商品价值。这一思路视角虽新,论题虽灿,实际操作起来,终究筚路蓝缕,前无绳范坐标,后无依傍垫撑,无法循阶而入山门,一切只能靠自己摸索。

事实上,经济与文学虽有一望而知的逻辑关系——一切形而上的人文学科终须依托形而下之物质基础,也即管仲所云“仓廩实而知礼节”,然“衣食住行”终究与昂然高蹈的文学间隔较远,即使其间有千丝万缕的联系,毕竟属于曲径通幽式的间接关联。从“吃穿用住”到文学艺术,“剪



不断,理还乱”,程序多多,路途漫漫,寻找两者之间多维度联系,确非易事。当然,这也是两大学科至今尚未正式联姻的客观原因。

风云际会,由我们历史性地蹚走这第一遭,真是望前路而惶恐,临迈步而徘徊,然靡不有初,自古成功在尝试。在学科大分化又大融合的当今,向着这新生之路,我们还是先迈出了第一步。当然,只有走的人多了,才会成为路。如果没有后来者,我们走过的这条路自会被荒草复蔓,所谓“成果”也将被埋没,我们的付出也将被遗忘。然而今天,我们只能只问耕耘不问收获,尽量走好第一步。我们的总体思路是从资料实证入手,立一论示一据,力避对空放论。如此这般,丛书至少在材料收集上会有所贡献吧。当然,我们究竟做得如何,还得让实践与时间去检验,或者说,得让这套丛书的实际发行量、重版次数及社会影响去确定其生命力之强弱。本丛书乃集体项目,各本著作的内容及文气势会因作者而异,其间得失,当然也只能由读者去品嚼掷评。

无论如何,我们在经济生活与文学之交叉研究方面,作了一番拓荒性的努力,力图寻找经济生活与文学艺术的各种联系,以及文学对经济生活的反作用力。史料粗备,论点略新,或可为中文研究者及文化学者提供某种参考。

这一研究项目原由许建平教授负责,2008年已由上海古籍出版社出版了其主编的五本专著。2010年秋,许建平教授调离我校。年底,学校决定改由张觉教授、裴毅然教授负责这一项目,这一项目得以继续推进。由于张觉教授任中文系主任,工作繁忙,除一些必须共同商量解决的问题,这十本专著的组稿、出版等具体工作由裴毅然教授操持,并改与河南人民出版社合作。

本丛书虽自成体系,但种种不足,实为难免,有蒙各路方家拨点,感激不尽。

张 觉 裴毅然

2012年3月20日



目 录

导 论	1
一、身体叙事视角:走出词体困惑之途	3
二、时代的身体重负:宋词身体叙事的发生及其演变	13
三、宋词身体叙事的基本内容及其特征	19
四、研究方法	28
五、研究意义	29
第一章 叙事主体:“我”是谁	32
第一节 叙事主体的声音与书写	33
一、事实存在的“声音主体”及其湮没	34
二、合作主体:词体叙事主体的核心特征	41
三、潜文本的可能主体:宋词研究的延伸课题	47
第二节 “我”的生存处境	48
一、叙事主体的时代特征	50
二、叙事主体的个性特征	59
三、叙事主体的性别特征	66
四、方外之士与神仙鬼怪:特殊的叙事主体	90
第三节 纠葛与衍变:“我”的矛盾与出路	92
一、时代与个性曲化	93
二、时代与性别隐喻	100



三、“我是谁”:词人自我认同如何可能	101
四、例证分析:欧词中的自我归属	107
第二章 叙事对象:在场与不在场的身体	117
第一节 女性身体:不可承受之轻	118
一、女性身体:词体叙事的特殊对象	118
二、具体部位的夸张修辞	123
三、动态婉媚:女性身体叙事的核心特征	128
四、属于爱欲与心灵的身体叙事	133
第二节 男性身体:不可承受之重	138
一、视角:男性纯粹身体的超越如何可能	139
二、身体叙事:男性对象的三次转换	142
三、绮筵公子、豪情志士、风骚雅士:男性身体 叙事的三种主要类型	144
四、从痴情男子到隐逸之士:男性身体叙事的 两极形象	149
五、从离愁别恨到怀古羁旅:男性身体的在场 与不在场	152
第三节 “泛身体主义”视角下的物象	160
一、泛身体主义:对象扩展与浓缩	161
二、泛身体主义:物象的心灵寄托	163
三、植物与身体:一种直接的隐喻	169
四、时代风雨:身体叙事的直接感受	177
第四节 轻重之间:宋词身体叙事的超越困境	179
一、内容推展:突破纯粹的身体观	180
二、身体转向:用心灵替代身体	180
三、女性身体叙事的重新建构:重返传统诗歌意象	181



第三章 形式与结构:身体叙事修辞场	187
第一节 独特的语言修辞形式	189
一、长短句:寓于文字的音乐语言	189
二、词体语言:情景修辞及其超越	212
三、词体语言:女性修辞及其超越	216
四、身体叙事的三种形式:词题和词序、用典、 长调与联章	219
五、身体叙事:形式与限度	231
第二节 时空结构:身体叙事的特殊场域	232
一、自然时空的“超自然性”	233
二、酒令声醉的交往时空	245
三、爱国叙事的政治时空	251
四、女性叙事的私人时空	252
五、情感叙事的心理时空	255
第三节 欧阳修词的叙事结构与形式:例证与延伸	255
一、私人意义上的时空叙事	256
二、公共性的文化时空	259
三、离恨相思的情感时空	261
 第四章 叙事风格及效果:身体维度	264
第一节 词派与身体叙事风格	266
一、差异化的身体叙事风格:宋词成熟的标志	267
二、豪放与婉约:基于身体叙事维度的反省与归整	272
三、俚俗与高雅:基于身体叙事维度的化解与整合	280
四、互鉴共赏:突破二元成见	289
第二节 转变与突破:宋词身体叙事特征	292
一、词才与身体叙事:技巧关系的推进	293
二、词境与身体叙事:意义上的推进	297



三、例证：欧词与身体叙事的“远与近”	304
第三节 身体叙事：透视词体流变的重要维度	308
一、身体叙事：揭示宋词的流变史	308
二、身体叙事：从词到曲的过渡	310
结 语	313
一、身体叙事与宋词修辞特征	313
二、宋词与唐诗、元曲身体叙事修辞之比较	314
三、宋词身体叙事与我国古代诗歌修辞传统	315
四、宋词身体叙事对当代文学现象判断的启发	315
后 记	317



导 论

《庄子·至乐》曰：“夫天下之所尊者，富、贵、寿、善也；所乐者，身安、厚味、美服、好色、音声也。”日本学者在探究中国审美特点时，认为：“一言以蔽之，主要是某种对象所给予的肉体的、官能的愉快感。”^①由此可见，中华文学艺术所围绕的一个极其重要的“归属问题”可以称之为“感官美学”，而非理性美学。与其说我们把主要精力集中于感官审美趣味，毋宁说我们已经将感官体验、生命感悟、精神意义等融为一体——注重“统觉感受”，崇尚从官能的美感中寻求生命意义的充实，以此领会生命的意义。显然，这成为领悟中华文学艺术瑰宝的一种典型心理范式与创造模式。

就词的文体特征及其语言修辞特点而论，词一般专注于“微观世界”的感官心理，身体修辞的特征尤为明显。如果从“叙事学”的角度看，词兼具抒情和叙事的“双重书写”的性质与功能。“抒情性”无疑是词体的一个核心特征，但如果仅限于此，则忽视其叙事特征，就会很难区分词体修辞与诗体修辞之间的“叙事差异”。或者说，“抒情性”并非简单文字修辞的独立元素显现出来，而是通过一系列“文字元素”的结构排列、建构场景、命题达意等传达出来。

文字还是那些文字，并没有多大的变化，如何解释从“诗”到“词”的逻辑转换呢？作为一种典型的“时代叙事”方式，其产生、发

① [日]笠原仲二：《中国古代的美意识》，北京大学出版社1987年版，第6页。



展、变化皆与该时代精神、时代情感相适应,属于时代要求的产物。就此而言,如其他文体一样,如果将宋词看成标示该时代特征重要的修辞样式,对其理解不能仅停留于抒情、应和、酬谢等传统解释模式,更应该拓展思维,将其看成贴合中国化的文化心理的一种叙事模式,反映其所特有的文学叙事形式、功能与价值。

作为一种与“载道”、“言志”不同的书写方式,宋词的文学叙事方式直接承袭了晚唐、五代花间词人抒发身体体验的特征,形成了一种强有力的内在循环机制,尤其是“基于身体”而形成的“身体叙事”成为一种更为彻底、开放的文学叙事形态。就文体叙事的变化而言,“身体叙事”已经成为词体区别于其文体的最典型特征。如果从词体发展的角度看,繁盛的“身体叙事”样式塑造出“词与身体叙事”之间相互共生、胶合、合流的独特文学景观和文化消费景象,也已成为词坛及商业繁荣的共同标示;如果将宋词视为一种文化生产、文化消费形式,那么由身体叙事建构起来的“词体作品”,则成为其中最重要的关键领域与主旨对象。从中国文学修辞传统及其流变角度看,宋词确实已超越前代,建构出以“身体修辞”为核心的新叙事文学,其文体内含了充分的商业性、大众性、情感性等特征。此解析模式与当前文学领域所盛行的大众文化消费现象有诸多暗合之处,自然成为深化宋词研究的一个新的重要视角。

基于“身体叙事”的文化消费样式、生活模式的差异,既是某种文学叙事形式生产、接受、传播的一个重要内容,也是标示一个社会存在状态的最真实、最直接领域,来不得丝毫矫饰与虚构。宋词以身体作为消费对象和消费材料,是“创造者和消费者”试图以此摆脱文化控制、趋向观念自由和自身解放的一个重要标志、象征与出路。这是“词人群体”实现自我文化认同,并进而影响大众文化心理的一种重要形式。

按照当代大众文化叙事的一般逻辑,可以发现:一种“经济生活语境”如果要向“文学语境”转化,有关“身体叙事”的内容就自然成



为“经济与文学”结合的“契合形式”，由此塑造出适合“身体存在”的文学循环空间与形式。“在寻求市场的最大化之时，各种产品必须利用具有最广泛合理性的核心价值标准，拒绝持异议的声音或与占统治地位的神话不相容的异议。”^①正是立足于“大众文化”或“通俗文学”的角度，宋词的“身体叙事”即“基于身体的书写形式”，恰恰能够满足易于理解的、通俗的、大众的内在心理需求，既可传播于文士书案，亦可流行于乐人歌喉，具有广泛的接受性和传播力，无论文人雅词还是基于生活俚语、常人身口的“俗词鄙调”，无不掺和着欢情、恋情、离情、悲情等诸多情愫，成为时代文学精神表达的一种最直接、“最自然方式”。因此，我们从“身体叙事”视角出发，以宋词的“时代书写”、“个性书写”来解读当时词人对于时代精神的反映，进而挖掘词体内在的文化精神，推动词学研究的深细进程。

一、身体叙事视角：走出词体困惑之途

“词”作为一种“音乐语言和文学语言”密切结合的独特艺术形式，自唐、五代开始盛行，至宋代处于鼎盛状态。从创作史的角度看，尽管“江山代有词人出”，无数词人为我们留下了多姿多彩、风格各异的作品，但在如何评定词之意义与价值的词学方面，则自北宋以来，迄今却似乎一直未能为之建立起一个“完整”的理论评价体系。虽然在零篇断简的笔记和词话中，也不乏精微深入的体会和见解，然而大都因为缺乏“逻辑性”的理论依据，遂在词学发展及词体批评领域为后人留下了无数困惑和争议。“由于早期之小词乃大多属于艳歌之性质，而中国的士大夫们则因长久被拘束于伦理道德的限制之中，因此遂一直无人敢于正式面对小词中所叙写的美女与爱情之内

^① [英]斯特里纳蒂：《通俗文化理论导论》，阎嘉译，商务印书馆2001年版，第158页。



容,对其意义与价值做出正面的肯定性的探讨。”^①或者,即使作出了正面的评价,也大多是基于“人性书写”的角度,基于“文体流变”的视角尚未立足。

音乐形式的发扬、贴近大众是促使词体走向繁荣的一条内在机制和重要标志,以至于专注于“音乐机理”成为南宋词演化的一个最显著特征。而音乐本身又是从属于“听觉”的,其“顺着人类发音器官的自然规律,从而创造出各种不同的格式”,以此方式歌唱、吟咏也必将“渐进自然”,具有“身体依赖”的鲜明特征。但“音乐的耳朵”本身属于一种被修饰、被升华的文化身体(器官),而非纯生理意义上的身体(器官)。而“词”之所以一贯遭到“士大夫们”所鄙薄和轻视,目之为“艳歌”、“末技”,讥之为“淫靡”、“郑声”,其根本原因就在于其对“纯粹身体”的担心与恐惧。这是造成诗词之间、词体正统与末流之间论争的内在的文化机制。即使是“一洗绮罗萝泽之态”、“使人登高望远”、“指出向上一路,新天下耳目”的苏轼的出现,也未曾解开旧有的困惑和争议,反而更增添了“另一种”“诗与词”间的争议和困惑。在苏词向诗积极靠拢的同时,立足于“别是一家”的李清照,却公开宣告与诗背离,欲与传统诗分庭抗礼,这样遂使中国之词学更增加了“另一种”更为深层次的困惑和争议。

这样的例证不胜枚举,如陆游在《长短句序》一文中,结合自己亲身的创作经验和心理感受,认为:“千余年后,乃有倚声制词,起于唐之季世……予少时,泊于世俗,颇有所为。晚而悔之。然渔歌菱唱,犹不能止。今绝笔已数年,念旧作终不可掩,因书其旨,以识吾过。”^②这种矛盾的心理,在当时不仅存在于作者之中,就连宋代著名的词学批评家王灼,在其专门论词的《碧鸡漫志》一书序文中亦云:

① 叶嘉莹:《嘉陵文集》第4卷,河北教育出版社1997年版,第216页。

② 陆游:《长短句序》,见张惠民《宋代词学资料汇编》,汕头大学出版社1993年版,第221页。亦见《陆游集》,中华书局1976年版,第2101页。



“乙丑冬，予客寄成都之碧鸡坊妙胜院，自夏涉秋。与王和先、张齐望所居甚近，皆有声妓，日置酒相乐，予亦往来两家不厌也。”他所写的《碧鸡漫志》五卷，就都是当时饮宴听歌后所写的有关歌曲的见闻考证。而当他20年后要将所写的这五卷《碧鸡漫志》付之刊印时，却忽然自我忏悔说：“顾将老矣，方悔少年之非，游心淡泊，成此亦安用？但一时醉墨，未忍焚弃耳。”^①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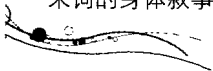
既然这样，问题到了今天该如何解决呢？走出争议与困惑问题的关键钥匙在哪里呢？我们知道，如果从诗歌的叙事传统看，西方诗歌自《荷马史诗》以来，其叙事脉络就一直没有中断过，诗歌的叙事功能无所不在，几乎每一个时代皆出现代表该时代特征的叙事诗，如《奥德修斯》、《拉奥孔》、《神曲》、《浮士德》等等，神话史诗成为其叙事的主要形式与内容。相比较而言，我国的叙事诗传统集中于《诗经》、汉魏六朝乐府以及后来的诗词曲皆存在着自身特有的叙事风格与叙事传统，民间性、口语化、片段性的情感特征等成为其最突出特色。^②《诗经》通过景物词、人物词、情感词的错综排列，营造出具“中国化的文学叙事”形式。这既是中国“诗歌叙事”的源头，也塑造出中国特有的叙事传统。^③我们借用“叙事学”的研究方法，对词体叙事主体、内容、形式及风格进行新的判定，将其中忌讳的“身体”纳入到诗歌叙事的解释模式之中，试图做出新的论说。可以说，要真正理解和把握宋词的词体特征，必须立足于其对“身体叙事”的各种态度、情感与情趣，与音乐、声律直接相关的听觉与文字所暗示、营造的

① 王灼：《碧鸡漫志》，见《词话丛编》，中华书局1986年版，第67页。

② 杨义：《中国叙事学》，人民出版社1997年版，第15页。

③ 中国诗歌叙事传统切合中国文化心理，反对刻意雕琢，通过不注重“叙事形式”来体现中华文化的审美观和生活哲学。相比较而言，西方叙事传统则基于理性形式主义，特别关注叙事（主体、时间、空间）诸元素的形式考量与解析，形成结构主义的叙事学。显然，如果借用西方结构主义叙事学的分析方法，会将活生生的中华艺术精神分解得“面目全非”。所谓的“中西会通”、“中西合璧”的分析方式，只是一种理想愿望，也许只有绝顶聪明、拥有大智慧之士才可能实现。





嗅觉、味觉、视觉、触觉等共同形成了特殊的“词体场域”，特殊的“身体叙事”促成了大量风格各异的词。

吴世昌先生曾说，词体的许多作品有一个特点，即在简短的小令中若隐若现地包含着一些动人的故事。故不论写客观的背景或主观的感受都是真切感人的。^① 所谓“诗客曲子词”，原只是一些“绮筵公子”在“叶叶花笺”上写下来，交给那些“绣幌佳人”们“举纤纤之玉手拍按香檀”演唱的歌辞而已。显然，其中的“故事”是词进行“叙事”的内在结构，通过“情感化”的“微观身体叙事”，彻底改变了“献身疆场、报效国家”的传统身体叙事模式。

关注词作叙事的“故事背景”或写作所传达的“故事意味”，成为词话的一个重要的内容。清叶申蓍专门撰写《本事词》两卷，对其详加收集与考察。^② 作为最早的话，即收录在《时贤本事曲子集》中有关苏轼《减字木兰花》词的一则“本事”：

钱塘西湖有诗僧清顺居其上，自名藏春坞。门前有二古松，各有凌霄花络其上，顺常昼卧其下。时子瞻为郡，一日屏骑从过之，松风骚然，顺指落花觅句，为赋此词。《减字木兰花》：双龙对起，白甲苍髯烟雨里。疏影微香，下有幽人昼梦长。湖风清软，双鹊飞来争噪晚。翠飏红轻，时下凌霄百尺英。^③

这则“本事”叙述了苏轼写《减字木兰花》词的地点（钱塘西湖）、时间（苏轼在“钱塘为郡”访问诗僧清顺时）、缘由（“指落花觅句”而赋）。尽管“本事”揭示的只是该词的语境问题，但实际上也是在建构词的叙事内容，增强词的叙事功能，使得该词的叙事更为生动、充

① 吴世昌：《宋词》，载夏承焘、王易等：《宋词二十讲》，华夏出版社2009年版，第7页。

② 叶申蓍：《本事词》，见《词话丛编》，中华书局1986年版，第2285—2383页。

③ 杨绘：《时贤本事曲子集》，见《词话丛编》，第10页。



满情趣。尤其是随着词体序言、题目的增加与提示,更使得词隐含着某种“叙事性”特征,“许多词背后,都有这样或那样的历史事件或个人情事”^①。由此一来,因事而触发的感慨与心灵的异动,成为词体叙事的主要建构形式。

宋罗大经解读辛弃疾《菩萨蛮》(郁孤台下清江水)词时,认为:

其题江西造口词云:“郁孤台下清江水,中间行人多少泪。西北望长安,可怜无数山。青山遮不住,毕竟东流去。江晚正愁予,山深闻鹤鹑。”盖南渡之初,虏人追隆裕太后御舟至造,不及而还。幼安因此起兴。“闻鹤鹑”之句,谓恢复之事,行不得也。^②

显然,这里词人和词评家无不将词视为一种“历史叙事”方式,隐含着特定的叙事意义与功能。

刘永济解析周邦彦《意难忘》(衣染莺黄)词时,有着精辟的论述:

此词描写一稚龄歌舞妓,极其工细,既以见此妓之美,亦可知作者爱惜之深,而且语不流于褻,此较柳七为胜,即前人所谓周词和雅处也。起四字写衣着,次句写其酬错,“低类”句,写其丰姿,“私语”句,写其言语。“莲露”三句,写饮宴之时,“夜渐深”三句,更添写一笔,以见“轻怜细阅”之情。换头,写其歌舞之妙。“未怕周郎”,言其唱曲之佳,暗用周瑜知音,闻曲有误必顾,时人谣曰:“曲有误,周必顾。”今言“不怕”,则无误也。“长

① 李剑亮:《宋词诠释学论稿》,人民文学出版社2006年版,第50页。

② 罗大经:《鹤林玉露》,《四库全书》本。《宋代词学资料汇编》,汕头大学出版社1993年版,第159页。



攀”句，写其情态，“贪耍”句，写其娇痴。结尾数句，言不忍以“恼人肠”之“些个事”告之，怕他“寻消问息，瘦减容光”。“恼人肠”之事，乃将与之离别之事也。从此数句看，作者对于此女子爱惜甚深。^①

这段分析不仅解析了叙事对象，也将叙事形式与结构淋漓尽致地显现出来，可以作为宋词叙事分析的典范。

吴世昌先生在论说周邦彦的词作时，认为其词“在描写情景中，暗寓故事，又凭借故事以抒情”。并以《少年游》作为例证，进而分析曰：“周邦彦能用寥寥五十字写一个相当成功的动人故事，而且形象鲜明、情节曲折，感情真挚、描写简洁，令人读后留下无穷的回味和想象。‘朝云漠漠散轻丝’一首上片回忆从前一个春天的早上和情人冒雨赶到他们的楼中，情景是凄凉而紧张的，仿佛连被雨打湿的花、柳和燕子都向他们表示同情，并为他们啼泣。下片用春光明媚、金屋藏娇的现状对比从前紧张而凄苦的情调，却反而觉得此刻心情倒不如从前令人共抱‘幽恨’、彼此同尝忧患来得回味深长。”^②

王兆鹏在评点柳永词的贡献时亦指出：“柳永则将赋法移植于词，铺叙展衍，或者对人物的情态心理进行直接的刻画；或者对情事发生、发展的场面性、过程性进行层层地描绘，以展现不同时空场景中人物不同的情感心态。因而他的抒情词往往带有一定的叙事性、情节性。如名作《雨霖铃》就是用铺叙衍情法，整个送别的场面、过程，别前、别时、别后的环境、氛围，人物的动作、情态、心绪都有细致的描绘和层层刻画。送别的时间、地点、主要人物（即“执手相看”的送别双方）和次要人物（“催发”的舟人）一一写出，相互映衬，犹如一

① 刘永济：《微睇室说词》。转引自李剑亮：《宋词诠释学论稿》，人民文学出版社2006年版，第69页。

② 吴世昌：《宋词》，载夏承焘、王易等：《宋词二十讲》，华夏出版社2009年版，第12页。